



长向文坛瞻背影

朱自清忆念七十年 ①

徐强 ② 编



长向文坛瞻背影

朱自清忆念七十年

①

徐强◎编

④ 廣陵書社

第

三

卷

记与佩弦最后之唱和诗

俞平伯

故友朱自清君的《犹贤博弈斋诗钞》中载诗云：“夜不成寐，忆业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羨君行健尚南强。（君，湖南人）”

诗作于一九四七年自滇归京后，盖最晚笔也。时君在清华园，邮寄相示。是岁丁亥腊月（已交一九四八年），余寄和一诗云：

暂阻城阴视索居，偶闻爆竹岁云除。
 拣枝南鹊迷今我，题叶西园感昔吾。
 世味诚如鲁酒薄，天风不与海桑枯。
 冷红阑角知何恋，退尽江花赋两都。

佩弦颇赏之。后失其稿。及余重来北京，友人得之于叶圣陶兄日记本中，惠录相示，失而复得，亦可喜也。

其后与圣陶兄书札往返中谈及此事。去岁三月二十六日圣陶复书云：

又取钞自日记中之尊和一首重读之。……二诗并观，自以佩作为胜。苏州有俗语云“赤骨肋相打”，似可取譬佩作。尊跋自我批评，弟表同意。

语重心长,尤为可感。所谓自我批评者,今已不甚记得,大约总是未去陈言、偏于感伤等,以其时情绪本甚低沉也。末句“两都”,谓南北二京。

佩弦兄于一九四八年夏逝世,年甫五旬,距北平解放只半载耳。余另篇所云“故人中岁卧蒿莱,不及明时际遇开”者是。若其清风亮节,贻则后贤,立懦兴顽,振起来学,斯诚不负生平之自期;即遗集流传,良朋手写,又岂博弈犹贤之谓乎?

曩岁京华再聚,城郊唱酬之乐,渺若云烟,而旧草幸存,爰沁笔书之,识吾怀感云尔。

时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戊午七夕于北京

(刊于《战地》1978年增2期)

忆佩弦

陈竹隐

今年,是佩弦(朱自清)的八十生辰,又是他逝世的三十周年。三十年间,我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使佩弦生前旧中国的那种魑魅横行、狼烟遍地、疮痍满目、国破家亡的景象,终于未能经过这帮国民党的代理人而在全中国重演;使我们的祖国又迎来了欣欣向荣、百花盛开的春天。现在,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在这个时候来纪念佩弦,就格外觉得有意义。佩弦生前渴望着一个新中国,相信在中国人民血与火的斗争中定会爆发出一个新的、独立富强的中国。但是,他终于被旧社会逼得贫病交加而死去了;他死在黎明前的黑夜,没有能到自己愿望的实现。现在,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并且,正进一步地实现着。佩弦有知,也当含笑于地下吧!

佩弦出身于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是相当贫苦的。“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冬晚上睡觉,只有一床破棉被,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我们家里人口多、孩子多,在旧社会要赡养这样一家人是很不容易的事。从很年青的时候,他就肩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一直到死,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这使他对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的苦难有较深的感受。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许多年中,他始终是同情广大受压迫、受屈辱的人民的;最后,并且站起来向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的斗争。

佩弦在旧社会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但是,象许多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走过自己漫长的道路。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我国著名的“五四”运动,并和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是同情他们的,但却不曾参加到他们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感到当时是“风雨沉沉的夜”,“前面一片荒郊”,却没有勇气在这荒郊里走出一条路;他知道自己是在“歧路中徬徨”,却没有能力摆脱这徬徨。

然而,佩弦是在随时代前进而前进的。一九二五年,他受聘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正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时代。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八日,北京工人、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到当时的执政府请愿,反动的军阀政府竟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十多人,重伤二百余人,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这一天,佩弦和清华学生一同进城,参加了集会、游行、请愿,亲历了这次历史的悲剧。他愤慨极了。回来之后,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向卖国政府进行血泪控诉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在这篇文章里,他忠实地记录了惨案的经过,痛斥了反动派的暴行,表达了对学生英勇行动的真诚钦佩。并且说:“我想,人处在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变成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是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在是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怕”的,但他并不为自己这种“怕”寻找开脱的理由,涂抹慰安的脂粉,而是老实地承认这种怕“实在是可耻的”。这正是他为人诚朴正直的地方。这使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

清华的学生韦杰三烈士也是在这一天被惨杀,佩弦的另一篇文章就是悼念他的。好几年之后,佩弦带我到纪念烈士的“断碑”前去吊唁,讲起了当时的情况,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统治了全国。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他又在苦闷中徬徨了。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两条路都没有走,而是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他先前曾经说过:“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中和主义。”他还没能摆脱这种思想,又顾虑着“妻

子儿女一家人，都指我生活”，便觉得“还是暂时超然的好”。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他是同情的。但只是限于同情而已。“比同情更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他这时的立场是自处于中间状态的。就是后来美国的艾奇逊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此后一些年，佩弦走到书斋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去了。他钻研中国的古典文学，在这上面付出了自己半生的精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于急剧前进着的时代，他这时却落伍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步步企图灭亡中国，使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一九三五年冬天，当时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六日，北平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变相的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头天夜里，佩弦对我说，他很担心学生流血。但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第二天，终于他自己也跟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

这次游行又有许多学生被打伤，佩弦知道后，感慨了很久。他是热爱学生的，抗日战争前和抗战胜利后，每次国民党特务在清华搜捕学生，我见他的心情都是郁怒和沉重的。我们家里曾多次掩护过进步学生。记得有一天晚上，突然一个姓王的学生来找佩弦，他是在山西某地做救亡工作的，反动政府正在抓他，他要求在我家暂住一夜。佩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严肃地倾听他叙述山西的救亡工作和沿途脱逃的情况，并且一再嘱咐我：“他是山西做地下工作的，沿途很辛苦。把床被准备得舒服点，我们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也是在这时候，佩弦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地中国驻军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佩弦随清华南下，辗转万里，由长沙而到昆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虽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佩弦却非常兴奋，因为中国抗战了。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

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他说：“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将来无穷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的心情和当时一部分崇拜外洋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的失败主义情绪，是截然不同的。

这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腐败，反动派们乘机滥发通货，大发其国难财，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们家里上有垂老的双亲，下有八个子女，生活愈益艰难；为生活所迫，我带着几个孩子去成都，那里物价比较便宜些。佩弦一个人在昆明，穷困得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一九四二年，昆明遇到了十年来最冷的冬天，佩弦只有一件旧皮袍，钮扣都掉了，破烂得不像样子。做不起棉袍，又没有大衣，便在街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披着从乡下进城去上课。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加之以营养不足，他得了严重的胃病，时时疼痛，吐黄水，吃不下东西。他的身体日渐憔悴，突然衰老了。

佩弦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他认为抗战第一，个人生活苦一些不要紧，从未发牢骚，有怨言。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战，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真相，他当时还是不甚了解的。他很少参加民主运动，以为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然而，事实在教育着他，他的高度正义感也促使他认识事实的真象，重新考虑问题。一九四五年暑假，他从昆明回到成都，曾对我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这不是容易的简单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青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他开始变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对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借以收买民心。他们想利用佩弦的声望，几次请他到蒋介石政府中去当官；国民党在昆明的什么“司令”“要人”，有的几次要来拜访他，尽管我们当时生活极端困难，他都一一地断然拒绝了这种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坚决表明了自己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立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是深夜传到我家的。佩弦很兴奋的到大街上去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回来时，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对

我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点，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

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在全国各地横行霸道的事实；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和残酷迫害，很快就把他这点希望也打碎了。几个月之后，反动派们就在昆明惨杀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造成了有名的“一二一惨案”。佩弦亲自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在死难的四烈士灵前致敬。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又到成都，准备举家迁回北平。这时候，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闻一多先生是他多年的同事和志友，闻先生的死，特别使他感到悲痛和激动。他愤慨到了极点，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他已经十多年不写新诗了，这次，却不能已于言，又写了一首。其中热烈地歌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的火；相信在这火的“遗烬里”，必将“爆出个新中国”！

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事先就传闻特务要捣乱会场，许多人不敢参加了。佩弦毅然出席大会，并且做了报告，讲了闻一多先生生平，正面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他的悲愤、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博得了全场多次的掌声，使许多人都纷纷落泪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们回到当时的北平。不到两三天，就看见宪兵警察很神气地殴打争生意的三轮车工人。佩弦愤怒地上前去和警察讲理。那些家伙仍旧辱骂着。佩弦高声地说：“他们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回来的路上，他非常激动地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该挨打？真可恶！”到了我们的临时住处，一连几小时他都沉闷不语。他的感情已经进一步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了。

这时候，佩弦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但他多次拒绝了我要为他添置一些衣服被褥的要求。回到北平，他在寄卖行里看见了一本碑帖，要价六万元。他很喜欢这帖。我劝他就花六万元，享受享受吧。他却说：“这不是六万元的问题。现在国家的情况，不是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当时的北平，“物价象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象在潮水里晃荡着”。佩弦的心转向了在苦难中的人民。他大声地喊出：“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他热烈地为人们“起

来行动”辩护,相信“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两千多人。佩弦痛恨反动派的迫害人民,签名于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教授宣言。在报上发表时,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国民党发动了各家反动报纸拼命地诽谤他,攻击他和其他签名的教授。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光临”到我家。一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的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我把这消息转告给佩弦,他只是轻蔑地应道:“不用管它!”“怎么,你准备坐牢吗?”“坐就坐!”是的,他并没有退却,他在反动派的面前坚定地站起来了。

当时,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又有个好心的朋友来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动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我把这话和佩弦商量,他却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还叫孩子右吗?”最后,我们得到一个坚决的结论:孩子已经觉悟了,我们应当让孩子前进;决不牵制孩子,决不干涉压制他们的思想!

在孩子稚拙的习作里,他发现了一段话,是引用鲁迅先生的:今天,“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他竟特地赞许了孩子。他已经强烈地感到了行动的必要。

国民党多年的黑暗统治使他毅然和当时的学生运动站在一起了。他在踏踏实实地进步。他向孩子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的小册子来看,向自己的学生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来看。当时,一个学生曾经对他说:“朱先生可以看看更深一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他却谦虚地说:“我自己过去对这方面了解很不够,要从头学起,要从初步的东西学起。”我曾多次见他和进步的同学谈话,是那样认真地倾听、提问,仿佛他倒是个在虚心求教的学生。他的治学和他的进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没有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那种浮夸气。当时,解放区盛行的秧歌舞已经传到了清华园,一辈子言笑不苟的他,竟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学起扭秧歌来了。有人听了曾大不以为然,表示这是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这种文艺活动,那时是被

人认为有“赤化”嫌疑的。但是,在下一一次一九四八年的元旦的晚会上,佩弦仍然带着病,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严肃地、诚挚地向新时代学习的精神,曾经使得许多师生为之感动。

佩弦真的变了。这年他五十一岁了,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身体更加衰老了,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更年青了!他看到了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他将唐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集成一副联语,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这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悍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了伪“国民大会”。清华竟有个别“教授”参加了所谓“竞选活动”,跑来要佩弦投他一票。佩弦断然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人我也不投。”表现了对这个反人民的会议及其所谓“代表”的极大鄙视。

也是在这一年,北平一些由美国培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创办了一个中间路线的刊物,名为《新路》。创办人中绝大多数是佩弦多年的老朋友,这些人邀请他参加,但他也断然拒绝了。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教授阶层的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着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天明。《新路》为了纠集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反人民的活动,用利诱的方式,出的稿费特别高。在这种情况下,佩弦坚决拒绝了他们,和中间路线划清了界限,表现了一个真正热爱祖国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他在当时一次讨论会的发言中曾经说: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向上爬,为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帮闲、帮凶;一种向下去,为人民服务。他正是在沿着后一种知识分子的道路前进着。

他对文学的看法也在变化。他当时已经认为:文学必须站在现代的立场,而现代的立场也就是人民的立场。他对解放区有成就的作家赵树理同志“与人民共同生活,打成一片”,及其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这期间,他还在许多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言上签过名,特别是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宣言说:“为了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现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据吴晗先生回忆:“当我请他签字的时候,他只看了一眼,便用颤动的手,一丝不苟的签上了名字。”当时,佩弦虽是教授中薪水最高的,但每月所得仅可买三袋多面粉。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还得每天吃两顿粗粮,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而佩弦的胃病已经极其严重,体重减轻到四十五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然而,他虽穷到不能治病,终于贫病而死,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拒绝了这种侮辱性的施舍,并且让孩子立刻把配给证退回去。在这天的日记上,他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直到临终前,他还谆谆嘱咐我:“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佩弦与世长辞了。他是被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逼死的!是被旧社会害死的!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佩弦,你现在可以瞑目了!中国人民已经获得解放了!你所憧憬的、渴望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上了!妄图使光明的新中国倒退到黑暗的旧中国去的林彪“四人帮”,也已经被粉碎了。我国人民定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实现一切进步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刊于《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出版)

我与朱自清先生

马星野

时间过得也真快，朱自清先生去世已经三十年了。记得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我因为在南京中央日报服务，所以最早得到北平发来噩耗的电讯。当天下午就自己一个人关在报馆的小房间里，来不及查资料，匆促之中写成不到两千字的《哭朱自清先生》，而与新闻稿同时见报。

接着我就洽商联系，筹划在南京文化堂开追悼会，段锡朋先生、罗家伦先生、陈雪屏先生和叶公超先生都是发起人。当天到的人很多，由胡适之先生主讲。记得胡先生于演讲中特别提到：“佩弦是我初到北大哲学系时候的学生，他很安静，不爱活动，但是与他认识的人却都很喜欢和他做朋友，他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可爱的人。”

后来，朱自清先生过去文学界的朋友计划替他编印全集，这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直在留意着。来台后，只能在坊间看到一种又一种不同版本的、摭拾了少部分作品粗滥地印出来的所谓《朱自清全集》，太不合理想。我想：能有人把朱自清先生的资料和作品做有系统的整理，那该多好！

然而谈何容易，要完全表现像朱自清先生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和学者，不只是本身要有相当水准的文笔，更要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深入的研究，最重要的还是一股写的热忱。所以只好继续等待，终于看到了一本合乎标准的书出现了。

最近，周锦君送来他所写《朱自清研究》书稿，实在是我渴望已久，也是极高兴见到的。这确是一件令我兴奋的事情。周君要我为《朱

自清研究》一书写序。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藉这一个机会,写一点“我与朱自清先生”,希望从几件具体的事情而更深一层表现出朱自清先生的为人,也许对这一本《朱自清研究》可以再提供一点什么。

——民国十二年(1923)春天,朱自清先生到了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教国文,当时我是那里的学生,才十四岁。他鼓励我多写,要我在课外多读些文学方面的书。他那时写作很多,当他在接到稿费的时候,总不忘记买几本书给我共同欣赏。这一年间,他有名的长诗《毁灭》、小说《笑的历史》、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陆续发表了,每次我这个做学生的也分享了快乐和荣耀。

——假期中,朱先生和几个同学到江北去玩,游了瀑布,回来后写了一篇两百多字如画如诗的小品文《白水濂》,后来算做《温州的踪迹》之三,收在诗文集《踪迹》里。这一次的旅游,我没有跟着去,还是隔了好些时候听同学谈起,也就没有注意。可是,朱先生却把他的文章《白水濂》写成条幅送我,并注记以未与我同游为憾。他是一位老师,是已经成名了的大作家,而我却只是十四岁的少年学生,他这样做也真是太周到了。

——因为朱先生所给予的鼓舞,我于民国十五年(1926)有了进入厦门大学读书的机会。在厦门,我一度为了缴不出学费几乎辍学。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由开明书店寄来了四十大洋。我的问题及时解决了,然而这却是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稿费呢!

——民国十八年(1929)我到北平,在清华园住过半年,时常去北院朱先生家盘桓。朱先生从不摆出老师的架式,也绝口不提过去的事,他完全把我当成朋友,我们两个人过从甚密。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确是很幸运的,能够遇到朱先生这样一位好的老师,得到有力的指导、鼓励和帮助。可是,朱先生自己却一生在穷苦中过日子,除了文学创作,除了学术研究,除了全心全力为下一代服务,从来不为自己打算的。

朱先生给我的太多了,当然他没有任何求报答的打算;但是在我,却不能不放在心上,我总是不停的工作,全力为国家社会奉献,希望稍微冲淡心底的痛苦。

现在,我看到一本写得非常有水准的《朱自清研究》将要出版,是十分欢欣的;而我又能藉着写序的机会,把藏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说了一些,更是感到高兴。最后,特别向周君表示我感谢之意。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台北市金华街“中国”新闻学会

(刊于周锦《朱自清研究》序,台北智燕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版)